

淺論所謂「文化大革命」

——為紀念「文革」發動四十周年而作

◎ 周良霄

1976年春間，所謂文化大革命已進入了即將結束的末期，行將就木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在一次召集他的幾個親信們談話時，不無傷感的回顧了自己的一生。說：「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了。人老了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定論。我雖然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論定了吧！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麼幾十年，把他趕到那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打進北京，總算進了紫禁城。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麼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麼交？和平交不成就動盪中交。搞得不好，後代怎麼辦？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毛澤東非常明確，是把他耄年親手發動和親自領導的、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當作他平生可以自詡的兩大業績之一來自吹的。但是，很遺憾，這已是來不及完成了。事實上，這時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早已敗象全呈。毛澤東為了應付這個敗局，也顯然久已捉襟見肘，焦頭爛額。不過在他的人生信條裏，他是認定自己永不會有錯，也永不言敗的。儘管如此，在談到文化大革命這根接力棒時，他還是無可奈何的承認了對這件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充滿掩飾不住的悲涼。這種失敗情愫的流露，仿佛就是他厚望所寄的四人幫即將覆沒的一席讖言。

這場所稱的文化大革命，從堂皇的明面上講，是毛澤東所設想的偉大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步驟。它首先在文化學術領域中引發，進而發展為荒唐慘劇，狠整全國各級領導幹部，攪成全國大亂，並大舉進行奪權，完成他個人絕對的專制獨裁統治，希圖把國家推向他長期刻意追求的、幻想加狂想的毛式共產主義。據說：為了建成這個毛式共產主義天國，在作為過渡的整個社會主義革命時期，這樣的運動，今後每七、八年便要進行一次。這次文化大革命便是這一系列革命運動的開端，而打擊的目標，集中鎖定為以國家主席劉少奇為首的共產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毛澤東是在1959年退出政權的第一線，而讓黨內長期排第二位的劉少奇全面主持黨務和國務工作的。應該說，一個專制自為的獨裁者，不容異己，剪滅功臣，這是古今中外的通例。特別是臣下功高震主的情況下，誅戮就是雄猜之主解除這一矛盾的必然手段。1949年以來，毛澤東所進行的一系列整功臣、排盟友的事例，都是這一故伎的重演。其中最惡劣的便是1959年廬山會議上，毛憑藉個人的專制淫威，橫蠻的製造了彭德懷冤案。彭德懷對毛所推行的極

左暴政所造成的全民饑餓，仗義上萬言書，情理俱切，而且言詞婉轉。即使這樣，也遭到毛的橫加打擊。原因也是功高的彭，敢于直諫，早已被毛認為生有反骨，在他死後必然生事（見黃克誠《自述》），所以，不擇手段，必欲把他剪除而後已。劉少奇從1943年延安整風以來，就是毛的主要助手，長期來穩居毛之後黨內第二把手的地位。毛、劉之間相互的關係基本上是融洽的，當然，也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矛盾。譬如：建國之後中國究竟如何發展？雙方已暴露出某種程度上原則性的分歧。劉主張的是鞏固新民主主義；而毛則正迫不及待地要加速向社會主義過渡。在對待民族資產階級和農業合作化的問題上，與之相應的，兩人之間在認識上也存在左、右不同的傾向。不過，總的來看，在整個五十年代以毛為主導的社會主義大躍進中，劉雖然也偶有差歧，但基本態度是緊跟配合，矛盾還並不明顯。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在毛澤東瘋狂推行的總路線（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設社會主義）、大躍進（十五年內超英趕美，領先蘇聯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和人民公社這所謂的三面紅旗的粗暴折騰下，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市場上商品匱乏，滿目蕭條，城市人民，饑饉交加。在廣大農村，大辦人民公社和集體食堂，廣大農民在共產風、浮誇風與強迫命令風的作踐下，蕩盡了僅存的家底，甚至于砸鍋毀灶。城鄉人民陷入于全國範圍的大災難，餓死的人超過四千萬。在這樣嚴峻的形勢下，共產黨當局不得不暫時從狂暴的幻想退回到現實中來。停辦了人民公社，解散了公共食堂，讓農民有一個喘息的機會，休養生息。在幹部中，也放鬆了繃得很緊的階級鬥爭這根弦，讓大家「白天出氣（發泄怨氣），晚上看戲。」公開保證三不（不打棍子，不揪辮子，不扣帽子），以緩和社會氣氛。在公開場合裏，當局一直把這個災禍歸之于蘇聯的逼債所造成。但是始作俑者的毛澤東，究竟不能不覺得理虧心虛，難辭其咎，而被迫在冠冕的外衣下，實行他久已申明的退居二線的許諾，讓劉少奇頂上第一線來。在劉少奇、鄧小平穩重、務實的調護下，予民休息。三年困難時期總算熬過來了。老百姓心裏究竟是明白的，謊言並不能掩蓋天下人的耳目。人們在經歷了幾年切膚之痛後，自然有了客觀的比較和新的認識：「毛主席也是人，人沒有不犯錯誤的。」

「少奇同志穩健，少奇同志成熟了。」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是劉少奇政治生涯中光彩的高峰。由于力挽「三年困難」之局已顯見成效，他受到了廣大幹部和人民的讚許。在一片讚揚聲中，劉少奇在大會上的講話顯然失態了。他明白承認造成困難的原因，七分出于人禍，三分才是天災。大躍進是冒進了，人民公社是辦早了。這無異當眾摑了毛澤東一記響亮的耳光。毛當時也極不情願地作了檢查，表示要承擔責任，要大家批評。在這個會上，「毛像一個熱情過份的愚笨之人，被推在一旁；他在1958年打倒的右傾機會主義者，現在又恢復了名譽。流傳于幹部當中的笑話之一是：『三天不學習，趕不上劉少奇。』」（迪克·威爾遜《毛澤東》）。

作為一個自命獨家擁有馬克思主義真理，一貫正確，習慣于聽受頌聖諛辭的獨裁者，現在卻遭到了自己的副手和許多屬下的埋怨和批評。毛澤東的憤慨之情是完全可以想像的。這腔怒火在以後的反攻倒算中才情不自禁的顯露出來。文化大革命爆發不久，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其中提到「1962年的右傾」，指的就是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江青在一次講話中更是恨恨連聲地訴說：「七千人大會憋了一口氣，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才出了這口氣。」（廖蓋隆《關於社會主義的幾個問題》）生性睚眦必報的毛澤東，下定決心要搞掉劉少奇，大概就是從這時候開始的。

在七千人大會上，與絕大多數對所謂三面紅旗持消極或不滿的人不同，有一個人卻挺身而出維護毛澤東動搖了的權威。他完全不顧事實，硬說造成三年困難的原因，不是毛主席的錯誤，恰恰相反，是人們不遵奉毛澤東思想，脫離了毛的革命路線，沒有按毛的指示辦事所造

成的。這個人就是已取代彭德懷任國防部長的林彪。林彪的發言大得毛澤東的激賞。這從他後來與羅瑞卿的一次談話中流露出來。毛問羅：這樣的講話你能講得出來嗎？他還特別教訓羅：「今後應該好好向林彪同志學習。」

七千人大會以後，毛澤東就精心策劃了大舉反攻，推倒劉少奇，以達到重返政權第一線的戰略。這年八月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他申明，他原在《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中所寫的一段按語，說在中國，資產階級已經消滅了，要更正。在隨之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他又聳人聽聞的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從這以後，他一步進一步地紮緊階級鬥爭這根弦，像一個被激昏的癡症患者，對劉少奇、鄧小平所主持的中央政府部門和一些負責幹部，一再進行嚴厲而且帶著惡諷的批評和指責。他明確警告，中國出現了修正主義，這是資產階級的反革命復辟。現在共產黨的天下，三分之一已淪入敵人之手；在文化教育領域，至少有一半，甚至全部不在我們手中。中國正面臨改變顏色的危險。他多次煽動性的對一些地方的軍政大員提問：北京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麼辦？他明確指出：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正睡在我們身旁。事後想起來，誰夠得上稱作中國的赫魯曉夫？這不明顯指著劉少奇的鼻子在罵嗎？但是，當時，好心的中國人，包括老于閱歷的劉少奇，恐怕都沒有往這方面想。當時，一般人都認為，毛澤東天生是一個偏激而頗具超前意識的思想家、理論家，他的想法和行事多是出人意表；言詞也習慣于追求深刻、生動、幽默，流于刻薄和不著邊際。在人們中流行這樣一種看法，讓毛主席去發揮他思想家的專長，搞理論研究去吧！具體工作讓劉、鄧來抓，是各得其所。

與毛澤東大煽階級鬥爭惡風的同時，林彪心有靈犀，投毛之所好，在他所掌握的解放軍系統裏，大搞突出政治的宣傳。所謂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澤東思想。早從1960年開始，林彪就在部隊系統大張旗鼓地宣揚活學活用毛澤東著作。此舉大得毛的歡心，故倍加讚許。62年以後形勢的發展，林彪心領神會，更加賣命地大吹特吹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頂峰的神話，為恢復和張大對毛的個人迷信、個人崇拜大唱頌歌。就在毛澤東神經質的階級鬥爭警告和林彪禮佛式的個人迷信雙重奏的震耳聲中，毛正式開始了他精心策劃的倒劉鬥爭的第一回合。

突破口選擇在由劉少奇的嫡系彭真所控制下的、被毛澤東指責為「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北京市。彭真就是1962年大會上擁劉批毛的主要人物。初戰的目標鎖定擔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吳晗實際上只是彭真權力集團的一個邊緣人物，而且主要是以民主黨派負責人的身份出現。他是著名的明史學家，解放前任教昆明的西南聯合大學。他利用寫明太祖朱元璋這個流氓出身，通過農民起義建成明朝的開國皇帝，以影射蔣介石，極盡諷刺、謾罵之能事，頗有影響。解放以後，吳晗擔任北京市副市長，同時是民主同盟的主要領導人。1956年加入共產黨。毛澤東對吳晗曾是禮重有加。吳晗自認為解放前借朱元璋罵蔣介石，不符合歷史唯物主義，損害了農民起義領袖。于是，一反舊調，寫成了《朱元璋》一書，大唱頌歌。明眼人自然看得出他的寄意所在。對歷史上的一個流氓開國皇帝，先是刺，現在是捧，指桑罵那個槐，又指桑捧這個槐，讓人讀起來總不免有些過份和滑稽。據說，《朱元璋》一書剛印出來，江青就索走了樣本，這本書也就躺在庫房裏不得面世。幾年之後，才作為內部發行處理。京劇《海瑞罷官》也是吳晗奉命之作。它是配合毛澤東鼓勵和表揚臣下敢于向皇帝直言進諫的號召而寫成的。劇本演出後，毛還曾接見過飾海瑞的著名演員馬連良，稱讚他演了一部好戲。但是當政治形勢另有需要時，毛就出手反覆、顛倒黑白，把這當作靶子來攻擊。這種作法在毛的政治縱橫捭闔中是習以為常的事，長期與他親近的人都指出過這一點。

江青秘密組織寫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至少是在1963年初。她在北京想找幾名槍手，均

遭拒絕。于是她只好去了上海，通過柯慶施找到了姚文元、張春橋秘密炮製。文章是經過毛澤東親自審定的。1966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匯報》上發表。文章的基調表面上是指責《海》劇是圖借歷史故事為1959年社會上所流行的所謂右傾翻案風張目，但實際上毛澤東這時仍把劇本的所謂「要害」隱而不宣。暫時不把底牌亮出來，顯然是毛在火力偵察中投石問路的手法。

在投石問路的前後，毛澤東同時也進行了一系列的組織上和軍事上的準備。66年9月，把長期幽禁在北京西郊的彭德懷出放西南，名義是讓他擔任三線（在內地進行備戰設施）的副總指揮。彭德懷臨行前，毛還親自接見了他，讓他把兩人之間的是非放在一邊，說：也許你是對的，讓歷史去作結論吧！我一直未忘記你。彭德懷因此大為感動。毛澤東的這番表演絕不能認為是真誠的。就在毛說這番話的同時，批吳晗《海瑞罷官》的文章在上海已基本完成。文章的「要害」，據後來毛澤東所親自點明的，便是「罷官」，罷彭德懷國防部長的官，是為彭德懷被罷官鳴冤翻案的。這就充分說明毛澤東的這套虛偽的做作只是為了麻痹與欺騙對手的手法。與此同時，與彭同案的黃克誠也出放山西。這都是為掃清突擊前進方向上的障礙。接著，11月，罷黜了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把中央的機要與保衛的權力交給自己的親信汪東興掌管。12月，又以突然襲擊的手法，罷黜了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由楊成武代長，把槍杆子更牢固地控制了起來。同時又調動大批軍隊，加強北京的衛戍。

姚文元文章發表後，國內知識界普遍是驚疑和憤慨。北京的報紙，根據彭真的指示，不予轉載。甚至在上海方面根據毛澤東的指令印成單行本廣向全國發行時，北京方面也拒不執行。這種公然的抗拒與冷落，無疑使毛澤東十分惱怒。在後來的追究中，彭真否認他對姚文的背景有所瞭解，不是有意抗拒。這，老于政治的彭真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唯一的解釋是：當時他確信有所恃而無恐。首先：《文匯報》只是一張地方性的報紙，對地方報紙上所發表的文章，中央和北京市的報紙完全有權選擇轉載與否。第二：對吳晗這樣高層民主黨派領導人，又是北京市副市長，沒有中央正式的決定並對北京市委通知，擅自進行公開批判，是黨的組織紀律所不容的。第三：在中央一線的領導中，一開始根本沒有人把吳晗一個劇本的問題當成什麼了不起的事件。鄧小平對此就曾不無諷意的說：「等教授（指吳晗）罷官了，咱們好打橋牌。」他們當時仍不過是把這類批判當成毛習以為常的偏執過左的挑剔而已。彭真在批吳這個問題上是硬頂、死保。即使在毛澤東一再親自亮明底牌，明指吳晗是為彭德懷鳴冤叫屈時，彭真仍是堅稱吳晗政治上沒有問題，與彭德懷也沒有私人交往。他近乎固執的堅持，對吳的批判只應該在學術討論的範圍內進行，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這種作法明顯的構成對毛澤東權威的公然挑戰，充分證實了毛所痛忌的在他退居二線後，大權旁落，自己已成為被人們當作泥塑木雕的傀儡的心病。因此更堅定了他一舉摧毀彭真所把持的「獨立王國」，從而直指劉少奇的「修正主義中央」的決心。

早在1965年7月時，中央根據毛澤東的建議，成立了以彭真為領導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開展學術批判。五人小組面對批判吳晗問題，擬成了一個《關於當前學術討論彙報提綱》的文件，由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員討論通過，呈交在南方的毛澤東，並得到了他的批准。而就在這時，毛卻派自己的老婆江青找林彪，讓林彪以自己的名義邀請，由江青主持，組織部隊的文藝工作者舉行座談，寫成一個所謂《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以軍委的名義簽發。江青的《紀要》與五人小組的《提綱》（《二月提綱》）無論在基本觀點、對形勢的估計與作法上，都是截然對立的。《提綱》是經過在京的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代表了黨的決策；而《紀要》則是由毛澤東唆使林彪以委托的名義，由江青炮製，毛澤東修改，再以軍委名義出籠。這就在全國人民面前首次暴露了中央一線與毛澤東個

人的對立和矛盾。同時也惹人注目的把江青這個原本在政治上沒有什麼分量的女人推上了中國政治的前台。在這之前，大家只知道江青即藍蘋，不過是三十年代上海灘上的三流演員。因為作了毛澤東的妻子，才受到中國人習俗相沿的尊敬。實則官階不過是十一級，除了掛名毛澤東的生活秘書之外，在外廷的官職也只是中央宣傳部文藝處的副處長。當然，實際上她還有一個令人慌目的職務，就是一直充當毛澤東的私人耳目，用江青的話說，就是作主席的哨兵。在退居第二線後的毛澤東，身感孤立和冷落，為了策劃陰謀倒劉，便只有利用這個私人的哨兵直接上陣，充當打手，最先便是在江青這個末流演員可以沾邊的文藝界張旗擂鼓。但由於她本身缺乏必要的資本，毛澤東就讓她求助于自己的戰友林彪。有了《紀要》作資本，江青便儼然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和代表毛澤東在政壇衝殺的先鋒。

在經過一陣報章上迷團式的牽強、羅織之後，批判的矛頭很快從吳晗及于鄧拓（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廖沫沙（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而上及于彭真所控制的北京市「獨立王國」和陸定一所掌握的中共中央宣傳部「閻王殿」。1967年5月4日，在北京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宣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和楊尚昆的倒台。毛澤東在南方遙控會議，會上，張春橋報告了姚文元文章發表前後彭真為包庇吳晗所進行的對抗活動；康生傳達了毛澤東的一系列有關批判彭真的指示。會議決定改組北京市委，撤銷五人小組彙報提綱，成立以陳伯達為組長、江青為第一副組長的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通過了惡名昭著的《五·一六通知》。《通知》號召：

全黨必須遵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

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的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五·一六通知》是一紙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檄文，它和稍後制定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從荒唐和極左的階級分析與階級鬥爭理論出發，要發動全國人民打擊和清除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領域的「走資本道路的當權派」和各種學術領域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什麼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簡稱走資派）？席宣、金春明兩先生所著《文化大革命簡史》就曾正確的指出：「走資派是一個混淆敵我的非科學概念」，是一個在內涵上「任意性很大」，包括毛澤東自己在內，「誰也沒有能夠具體講清楚」的黑帽子。「因此，文化大革命中，黨和國家以至企事業單位的各級領導幹部，絕大多數都曾經被打成了『走資派』，或是『犯了走資派錯誤』。」（第363頁）任何群眾，對領導幹部的所有不滿意的言行，都可以扣上走資派的帽子，利用大字報揭露攻擊，召開大小會議批判，而且一旦被揪鬥，立刻就靠邊站。是是非非，都不容分辯。因為，據說群眾運動是天然合理的。他們只有等到運動後期再甄別定案。其結果是凡是領導幹部，即所謂當權派，都是打倒了再說。美其名是接受群眾運動的考驗和鍛煉。不少幹部就是在挨受揪鬥的殘酷折磨下，等不到甄別定案，早已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淪為不明不白的冤鬼。在運動的大批大揭、深挖深肅中，除當權派之外，又有數不盡的「黑幫」、「黑線」、「集團」、「爪牙」等匪夷所思的株連、羅織，受到牽連的人更是無法統計。事實上，文化大革命的後期，

真正以所謂走資派定性的人，幾乎找不出多少來。而且既然所有的當權派都被打成了走資派，法不責眾，這個在運動初期大得可怕的帽子，到此時，也已構不成什麼了不起的罪名了。

至于所謂「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更是一個荒誕不經的提法。學術是一個科學問題，在科學領域裏，只有真理和謬誤之分。而且它們又都是和一定的生產力水平與認識水平相關連的。在科學發展的道路上，謬誤往往是真理的先導。而真理也不可避免的總是具有相對的性質。把一些有成就的學者們斥為資產階級反動分子，明顯的是對學術的玷污和褻瀆，正好表明了毛式文化革命是一種用政治來滅絕科學的文化專制主義暴政。其實，在中國這樣一個文化落後的國度裏，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國人，對什麼是學術？什麼是學術權威？誰當得起學術權威？恐怕都並不清楚。我認識一個青年中學教師，教英語，就教在一個縣城的中學裏。文化大革命中就作為反動學術權威被學生們揪鬥，連頭髮、眉毛都被剃光。理由很簡單：桌頭有一本厚厚的英漢字典。能讀這麼厚書的人，還不是學術權威？再說，英語是英帝國主義的洋文，怎麼能不反動？

彭真倒台、北京市委改組，中宣部受到顛覆性的衝擊，頓時激起了北京市機關、各文化團體，特別是大、中學校學生，蜂起對彭真反革命修正主義黑幫和中宣部閻王殿揭發、批判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高潮。各個單位都出現了一批勇于率先起來向本單位領導造反的造反派。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學哲學系職員聶元梓等七人貼出了質責北大黨委書記陸平的大字報。這張原是康生導演的大字報立即由他送給了在南方的毛澤東。毛大為稱賞，責令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在當晚便向全國廣播。于是，火乘風勢，風助火威。在全國也就轟然爆發了揭批和揪鬥本單位領導的高潮。在毛澤東「造反有理」的煽動下，造反成了燃遍神州大陸的野火。惡名昭著的紅衛兵組織也首先在北京的中學生中出現。

迅速蔓延的造反派隊伍中，主要是年輕、單純、輕信而容易衝動乃至于盲動的學生。其中自認為出身優越、即所謂紅五類人（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子弟。特別是一批高級幹部的子弟，他們自恃根正苗紅，認為天生的最富有革命的無產階級感情，最聽毛主席的話。他們是一批被毛澤東階級鬥爭仇恨煽動起的造反派先鋒。在機關幹部中，情況就比較複雜。有生性衝動的勇敢分子，有存投機心理，希圖因利乘便謀取好處的冒險分子。也有過去受到打擊和壓制的受害者，起來圖謀報復。對於這些受過打壓的人，無論如何還是值得同情的。還有極少數的一部分人，他們代表的是那些始終存在于共產黨專制統治下，代表反獨裁、爭民主的這股伏流的佼佼者。這股伏流在共產黨統治時期，是始終存在的。在1957年的反右中，這股伏流遭到致命的打擊。但是，石在，火種是不會滅的。在文革中，響應毛澤東的號召，「造反有理」，他們起而爭鬥，也是情理中的事。但是，文革中的造反派始終是由毛澤東一手操縱和利用的工具，因此，所有這些人都毫無例外最終成為運動的犧牲品。造反派，包括年輕的紅衛兵在內，都不過是毛澤東在政爭中按照毛的節拍，肆行惡作劇的小卒子。他們都是以鬧劇登場而以悲劇下場的。

有人造反，自然也就有人保皇。當時被造反派斥為老保的保守群眾，基本上是那些在原單位領導下受過惠的人，包括下屬的大小部門負責人、共產黨員、共青團員、業務骨幹、勞動模範之類。一般習慣于循規蹈矩、膽小怕事的群眾，也都寧願追隨保守派之後；或者猶豫觀望，暫時徘徊在中間偏右的立場。保守派以維護共產黨的絕對領導自居，指責誰造反誰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是右派翻天。在他們的心目中，反擊造反派就將是57年反右派鬥爭的重演，都想在這場鬥爭中表現得更左、更積極，以圖邀厚賞。因此，造反和保皇兩派一開始就處在尖銳的對立中。從大字報互罵、口舌相爭到拳腳並用，時有發生。相比之下，保守派不

但在人數上佔壓倒多數，而且把持著單位的物資財用大權。造反派則處于被壓制被圍剿的地位。

為了控制這些造反派滋事，領導被揪而陷于癱瘓和混亂的單位，在京主持一線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急忙作出決定，派出工作組，以圖掌握和穩定局勢。省、部的領導，也都奉命或者聞風，秉照這種精神派出了工作組。工作組的任務就是代行原單位黨政大權，組織群眾，清剿造反者。在北京的中學中，還把教員集中起來，進行審查、整肅。對學生，則以反干擾、「抓游魚」為名，清查右派分子和小反革命，並聲言順藤摸瓜，揪出支使的黑後臺。劉、鄧的作為正就是要重複57年反右派鬥爭的舊套。他們以為現在是造反派乘機搗亂，是對文化革命的干擾，必須先掃除干擾，以保證運動的正常開展。一時間反干擾、抓右派的風頭大盛。這時的毛澤東，卻一直拒絕劉、鄧要他回京主持工作的請求，逗留在南方隔岸觀火，伺隙出擊。對劉、鄧派工作組的決定，不作任何明確正式的表態。直到7月17日夜，正當工作組反干擾鬥爭火熱的當兒，突然回到北京。

對一些因問題嚴重而失去控制的單位，由上級派出工作組，接管領導權，進行整治，這是共產黨慣用而且久已證明有效的傳統工作方式。在4月份間，任陳伯達進駐《人民日報》，就是一樁近例。因此，從劉、鄧到各級領導幹部，對這種作法，都認為事所當然，奉行惟謹。毛一回到北京，托故不聽劉少奇登門彙報，卻派江青、陳伯達、康生頻頻去往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對那裏的造反派表示慰問和支持。接著就明確表態：工作組壓制了群眾的革命運動，甚至指責工作組幹盡壞事，必須統統驅逐之。7月26日，在由毛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乾綱獨斷，宣布全國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組犯了方向路線錯誤，並作出了撤銷工作組的決定。根據這一決定，各機關、各學校的形勢陡然一變。受壓制和打擊的造反者有了毛澤東的支持，群起驅趕工作組。從整群眾這一點上講，工作組確是遵從共產黨的傳統手法，重複57年反右派的老套，作踐起來鬧事的小民的。據統計：在北京的二十四所高等學校裏，有10211名學生被打成右派，2591名教師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中學和機關的情況也大略相同。工作組還整了一大批人的黑材料，準備將來進一步算帳。從這方面講，工作組確是沒幹好事。在它被造反派驅走，被迫離開那些單位時，他們又一手撮成那裏的文化革命委員會和領導小組，把持運動的領導權，繼續對造反派群眾進行壓制與打擊。

有所恃的造反派群眾現在更是無所恐懼了。他們已經明確的得到毛主席的支持。他們組成了自己的戰鬥組織，包括所謂紅衛兵。保守派也依樣組織起來，兩相對抗。一時間，每一個單位內大小戰鬥組織勃起，大的千百人、甚至萬數，小的僅一、二人。各擁旗號，與觀點相近的組織結成同盟，社會上開始出現了有組織的對抗。為了追究派工作組前來的領導機關的責任，同時追繳被工作組所帶走的「黑材料」，造反派攻擊的矛頭，已不再限于原單位的所謂走資派，而是逐級上追，集中到省、部的大當權派。同系統內的造反派也因此聯合了起來，組成浩浩蕩蕩的「大兵團」、「縱隊」，向所在的省委、部領導衝擊。保守派也通過串連，組成了自己的聯合大軍。到處都是兩大陣營的激烈對抗。這樣，派仗就成了彌漫全國的無盡鬧劇。被造反派追索的省部領導大員，成天東躲西藏，已無法正常工作，甚至被劫持、綁架、扣壓。有的省領導，只好倉皇前往軍區機關躲避。但造反派仍是窮追不捨，開始圍困和衝擊軍區，往往釀成造反派與軍隊間的衝突。開槍殺人的事，遂有發生。

屈于毛澤東的專制淫威，劉少奇、鄧小平，還包括那些同意或支持派出工作組的中央領導人員，都被迫接受毛澤東的決定，無可奈何的作出檢討。他們不知道自己有什麼錯，只好承認是「老革命碰到了新問題」。問題的嚴重性還在于，幾乎所有全國各級領導幹部，都是派工作組的積極支持者和奉行者。在他們的後面，還有被派的人數可觀的工作組成員以及支持他

們的龐大保守派群眾。他們不服、不滿、懊喪，乃至消極對抗，這是很自然的。

針對這一情況，8月1日至16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京召開。會上，毛澤東只是使出全身解數，逐個拉攏說服，才勉強湊足了過半票數，批准了撤除工作組的決定。會上，他還親自寫成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不指名的對劉少奇進行指責，硬把派工作組說成是實行資產階級專政，並把它與1962年的右傾相聯繫起來。善良的中國人民，從姚文元文章發表起，隨之是彭真、陸定一倒臺，造反的風浪迭起，大家都感到山雨欲來，而懷著極大的疑懼與不安。他們都在問：毛主席到底又要幹什麼了？現在，總算圖窮匕首見，原來真正的目標是黨內第二號人物、國家主席劉少奇。這個會上把劉少奇的黨內排名，從老二降到了第八。名義上雖然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但實際上除了閉門思過之外，已完全從權力中心排除。鄧小平也同樣被剝奪了全部權力。另一顆耀眼的政治明星林彪則代之興起，以唯一的副主席排名在毛澤東之後。全會還通過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作為指導整個運動的方針。

這時，在全國範圍內，紅衛兵運動正在如火如荼的開展。紅色恐怖籠罩全國。毛澤東猶以為未足，異想天開地提倡大串連和親自接見和檢閱來煽風助長。造反派，其中尤其是學校的紅衛兵踐踏人權、草菅人命，達到聞所未聞的野蠻程度。北京師範大學的國學專家、老教授劉盤燧就是被活活打死。著名的杰出作家老舍便是不堪凌辱憤而投湖自溺。這一類的冤魂究竟有多少？簡直無法統計。因肆意抄家而給無辜的人們所帶來的破壞和損失，超過明火執仗的強盜的洗劫。民族文化、歷史遺存受到驚人的毀壞，甚至殃及到明十三陵發掘出來的明萬曆皇帝的朽骨；連馬戲團訓練的狗、馬都不得幸免。這時期，北京中學的紅衛兵們也開始分化，一些高幹家庭出身的人，因運動已衝及他們的父兄而開始轉入于不滿和反對，發展為「聯動」（聯合行動委員會）分子。有的研究者吹捧他們是最早起來反對中央文革極左路線的先鋒。其實，他們這樣做，完全是因為運動觸及到他們的既得利益。他們的劣跡、他們在對待所謂階級敵人和黑五類子弟中一貫的法西斯暴行是永遠也無法洗刷的。

10月初，毛澤東正式把派工作組問題扣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罪名。毛澤東悍然發動文化大革命，要奪回失去的中央一線的權力，打倒劉少奇，這是決定無疑的。預先準備好的帽子便是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然而，運動剛開始，就橫生了一個新的枝節，即派工作組的問題。抓住派工作組的問題，毛澤東輕率地以此為尋釁的由頭，扣上一個鎮壓群眾運動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罪名，理由是群眾運動是天然合理的。這種民粹主義的理論當然站不住腳，且既不符合共產黨一貫的傳統，也違反後來毛本人在文革中大派軍、工宣隊的事實。可見它（派工作組罪名）的強辭奪理是彰明昭著、路人皆識的。用這樣一個荒唐的罪名來打擊別人，當然會引起除少數造反派群眾之外的廣大人民，上自劉、鄧和執行過這一政策的領導幹部，下至為數眾多的保守派群眾的不服和不滿。為了使他們脅服，毛澤東悍然給這大群人扣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帽子。然而帽子越大，就越使被戴這頂帽子的人不服和憤慨。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至少是犯了魯莽滅裂的為淵驅魚、為叢驅雀的大錯誤，把浩浩蕩蕩的各級執行者與保守派群眾趕到了劉、鄧這一邊。這就同時也給毛澤東本人造成了一個可怕的映像，即：願意跟劉少奇的人遠比跟自己的人多得多，並證明了他近年來擔心的修正主義在中國已經發展，這個江山改變顏色的危險已迫在眉睫的估計是真實和正確的。因而發動這場文化大革命，徹底打倒劉少奇之流，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完全及時的。這就更促使毛澤東決心把這場運動，突破它原只在文化領域進行的框子，肆意在全國各個領域中廣泛無所限制地開展起來。10月5日，發布了《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要求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按地方的辦法進行；同時撤銷了早先由總政發布的關於軍隊院校的

文化大革命運動在撤出工作組後由院黨委領導的規定，從此開始了一個在全國「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浪潮。共產黨全國各級黨委全部癱瘓。12月15日，發布了《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19日，《中共中央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即《工業十條》正式向全國下達。從此運動更廣泛推及于全國所有工礦企業、農村生產大隊，以及除野戰部隊外解放軍各機關院校。全國上下都捲到無休止的揪鬥當權派、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執行者和難辯是非的派仗，以及在農村變本加厲的階級仇殺的瘋潮中來。

與此同時，批劉也明顯升級。12月18日，張春橋神秘的在中南海西門單獨約見了清華大學的造反派頭子蒯大富，告訴他：中央那一兩個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們革命小將應該聯合起來，發揚徹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們搞臭，不要半途而廢。王力《反思錄》證實：「大約在二十七日以前，毛主席講了話，說現在看來，對劉少奇問題不能像過去那樣內外有別了，現在不公開批判不行了。要公開批判。」一個名為「王光美專案組」，實際就是劉少奇專案組也悄悄的成立。從此，打倒劉少奇的鼓噪聲響徹北京街頭。從早先勸阻和制止公開貼出劉少奇的大字報到唆使和鼓勵公開申明打倒劉少奇，說明運動進入了一個重要的轉折。

12月26日，是毛澤東的73歲生日。在一個小型宴會上，他向中央文革成員舉杯祝酒，說：「祝開展全國全面內戰。」接著1967年1月8日，毛澤東召集中央文革小組開會，充分肯定了上海的造反派對《解放日報》、《文匯報》的奪權行動，說：「這個方向是好的。」要展開「全面內戰」、要「奪權」，表明了毛澤東的心目中，要徹底打倒劉少奇，除發動造反派，公開的、大規模的把劉少奇批倒、批臭之外，還必須通過內戰的形式，奪取各個部門和地方的領導權。認為「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極少數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手裏奪權的鬥爭」，「是在新形勢下所採取的又一偉大的戰略措施。這個措施將推動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來一個新的飛躍。」毛還指出：「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道路當權派手裏奪權，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即無產階級消滅資產階級的革命。」（轉引自《紅旗》1967年第2期評論員文章《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是共產黨和國民黨鬥爭的繼續。在「一月革命」、即上海市奪權的影響下，全國上下，各級機關中的奪權鬧劇就緊鑼密鼓地表演開來。繼上海之後，山西、貴州、黑龍江相繼比較順利的完成了奪權，但這些都是有內線由中央文革牽制完成的；這幾個地區奪權雖然完成了，但是保守一派的反對勢力仍然十分強大，派鬥從來沒有停息。至于四省市之外的省、部和地區，奪權則在兩派、甚至幾派中輪番上演，為所屬部門的大印、物資和辦公室房間，大打出手，沒完沒了。弄得國無寧日，民不聊生。

奪權這一舉措完全又是毛澤東魯莽滅裂、主觀輕率，任意荒唐的自殺性決定。後來，毛也不能不承認：「打倒一切」、「全面內戰」，是文化大革命所犯的兩個錯誤。它把全國的黨政機關負責幹部當成自己的敵人，加以打擊。他不當一回事的估計，全國的奪權在約兩個月內完成。至于這種奪權內容是什麼？是奪機關的黨、政、財、文全部大權？還只是文化大革命領導權？對業務是監督，還是也要一併奪過？誰都不清楚。所有的政權單位一律大奪特奪，不管是否是走資派或頑固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分子，也都採取先奪過來再說。至于奪權以後如何管理？也沒有預案，先說是實行老中青三結合，後來才確定由造反派頭子、駐軍部隊的代表和革命領導幹部的三結合。可見老耄的毛澤東，對此原毫無成算，但他仍然用先有事實，然後才有理論；革命是群眾的創造，他是最相信、最尊重群眾創造來安慰自己，自欺欺人。

過去所有擔負過實際工作的領導幹部幾乎百分之百都不是被這一派，就是被那一派在揪打，

統統靠邊站了。現在要成立革委會，講三結合。但是造反派頭子，不過是政壇的暴發戶；而軍代表充其量也只會空喊政治口號而已。真正要把工作抓起來，還得依仗有水平、有經驗的舊有領導幹部。就是因為沒有可供選擇，又能為兩派群眾都接受的「革命領導幹部」，毛計劃二三個月內奪權應見眉目的估計，只好無限拖延。這時又發生一批元老拍案而起，「大鬧懷仁堂」，怒斥中央文革的大事。這些元老們對自己的老戰友、老部下紛紛被揪；對被稱為「聯動」的幹部子弟（其中也包括他們的親屬）被打擊、遭收禁，已久懷憤怨。2月中，在有中央文革成員參加的會議上終於爆發了所謂「二月逆流」。他們雖然在毛澤東的專制淫威下，都被責令檢討。但毛對於他們，終究仍不敢于過為己甚，最後還是藉口以團結為重，曲意對他們進行安撫。所有這一切才逐漸讓毛澤東察覺到對領導幹部打擊過寬、過大，實際上只能孤立自己，而壯大保守派的隊伍，有利于自己的敵人劉少奇。因此，在67年2月初開始放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分子」這一提法。3月號的《紅旗》社論稱，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領導幹部，只要不頑固堅持，作出檢討，就可以作為革命領導幹部，結合到革命委員會裏來，名之曰挽救大多數幹部。即使如此，由于兩派的僵持，結合誰都無法實現。在智窮力拙的情況下，對於這些兩派混爭互鬥的地區和單位，毛澤東只好訴諸軍事管制。2月中，全國實行軍管者已高達6900多處，已經動用團的兵力。當時統計「三支」（支左、支工、支農）兩軍（軍管、軍訓）參加的軍人人數高達280萬之眾。可悲的是軍隊支左，支的絕大多數又竟是保守派，而不是毛所希望的造反派。當時，派別紛起，多如牛毛。甚至一個人也可以獨樹一幟，組成戰鬥組織，發聲明、出海報，但大體上都以對本省市的某一個領導幹部的揪和保分成兩個陣營。而這些領導幹部的基本面貌又不清。因此，究竟反誰算革命，保誰就是保皇，誰都弄不清楚，最終都要等中央文革表態，才能確定，而事實上這一時又根本不可能作到。一般來講，造反派成員比較複雜，他們為了追索工作組整他們的黑材料，追究派出工作組的責任，曾經窮追省、市委領導，甚至圍攻窩藏他們的軍區機關。他們與軍隊的關係是比較緊張的。相對而言，保守派成份好，其中很多就是複、轉軍人或軍人家屬。甚至老婆就是當權派，孩子是保守派。這樣，支左的軍人一下來就選擇了支持保守派，這是很自然的。軍隊的介入，使派鬥更進一步升級。軍隊和造反派直接對抗的事件屢屢發生。

這時，曾經執行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幹部，只要在形式上作個檢討，就可以成為結合對象；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如過河之鯽，這兩頂帽子都算不上什麼新鮮的大罪名了。要打倒劉少奇，就得鍛煉新的罪狀。于是，毛澤東就把叛徒、特務這類罪名，當成殺手鐮，來置劉少奇于死命。早在文革前夕，毛澤東就認為黨內有叛徒，「始終未解決。」因此，他對戚本禹指太平天國的李秀成被俘後所寫的《李秀成自述》為叛徒的供詞的文章十分欣賞。他曾通過江青，向戚本禹表示支持；並讓他請教康生，再寫第二篇文章。老奸巨猾的康生，在文革開始不久，就已看出來，「查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歷史，定個走資派，還是內部矛盾，定個叛徒、特務，就永世不得翻身。」因此，在1966年8月18日毛接見紅衛兵時，康生就在天安門城樓上支使紅衛兵去搜尋檔案資料，挖查叛徒。紅衛兵在舊報章上找到了1934年被國民黨拘禁在北平草籃子監獄的薄一波等61人，在奉中央指示，履行具寫悔過書後得到釋放的材料。必欲置劉少奇于死地的毛澤東，這時便揀起這個在中共七大時已審查定案的問題，當作新的武器，來對付劉少奇。1967年3月16日，中央正式批發了《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61人的自首叛變材料》，指出：「薄一波等人自首叛變出獄，是劉少奇策劃和決定，張聞天同意，背著毛主席幹的。」21日毛又批准立案審查劉少奇歷史上兩次被捕和叛變問題。5月1日，毛公開宣言：劉少奇1925年被捕過，後來叛變，住在北京，劉少奇一條路線，一個理論，一個班子。把劉的問題往叛徒上拉。6月3日劉少奇專案組成立，由康生出任組長，成員包括謝富治、汪東興、葉群、楊成武及中央文革的江青、姚文元、戚本禹、關鋒參加，由江青直接負責抓，戚本禹任秘書。具體工作則由謝富治、汪東興擔任。專案組派出

了數千人員，翻閱歷史檔案，對有關人員孟用潛、楊一辰、丁覺群、王世英等進行野蠻殘酷的刑訊，以逼取需要的證據。張重一當時已是癌症晚期，生命垂危。為了逼取證據，仍對他進行拘留，在二十七天裏進行了二十一次審訊，「窮追緊逼，終于逼使他斷斷續續地交待了有關王光美特務的問題。」直至死去。江青在專案組的一次會議上還惡狠狠地說：「有個案子，我很不滿意。王世英說他半身不遂，還能全家去照像，摔了一跤也沒死。你們右傾。要審訊，死就死。要狠狠地鬥，集中火力，幾個人不行，要一二十人狠狠鬥。死是他自己要死，閻王請他吃燒酒。」這樣的話讓人聽起來真是毛骨悚然。所有有關劉少奇叛徒的材料便是在這種情況下逼訊出來的。

為了讓造反派群眾放手揪鬥劉少奇，毛澤東在7·20武漢事件前離開中南海，去往南方。到這個時候為止，劉少奇仍居住在中南海內，除中南海造反派在戚本禹支持下，有過批鬥之外，外界的造反派不能直接觸及他的人身。毛澤東一走，造反派就包圍了中南海。參加和聲援的單位達二千多個，人數逾數十萬。他們在中南海牆外呼噪叫戰，要求把劉少奇趕出牆來，交群眾批鬥，這場鬧劇持續達一個月之久。與之緊密配合的，在戚本禹的策劃和指揮下，中南海內的幹部揪鬥了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和他們的妻子。8月5日，二百多萬人集會天安門，紀念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發表一周年。聲討劉少奇的聲浪一個高過一個。此後，隨著社會每出現又一次所謂「右傾翻案風」的時候，揪劉和批鬥劉少奇黑幫分子的集會與呼嘯便一陣緊似一陣地展開，但實際的對劉鬥爭已集中在專案組的羅織定案。而社會上的實際情況則是派戰大行，無法收拾。

從一月風暴（67年1月）到九大召開（69年4月）的二年多時間裏，整個中國，包括城鄉所有的上下機關、學校、工廠、農村，無一例外的陷于以武鬥為特徵的派仗。各地方、各單位的派仗都圍繞支持某一個與本派密切的革命領導幹部和反對另一個與對立面有瓜葛的「走資派」，進行奪權鬥爭展開。群眾組織中革和保的色彩事實上都已泯失，成為一派與另一派人在權力搶佔上的拼死爭鬥。支左的軍隊往往是各支一派，軍隊不但親自出陣，而且暗送槍支彈藥來支持互鬥，釀成震驚全國的武漢7·20事件，以及四川、廣西等地區的武鬥暴力衝突。機關槍、大炮一齊上陣。有的地方整條街道、整個地區夷為平地，尸橫遍野。而毛在7·20武漢事件之後，還明令向造反派發槍。且指示對造反派奪槍不加制止。江青甚至惡狠狠的提出所謂「文攻武衛」。這些火上加油的作法，無疑更使派仗猛烈升級。1967年夏秋之間，全國武鬥大行。極左浪潮越燒越猛。

無盡的派仗使各地的革委會遲遲無法建立起來，北京的混亂到67年8月外交部奪權、火燒英國代辦處達到了極點。毛澤東不能不考慮對無法控制的局面加以制止。這就不能不對這個毒瘤的中心中央文革少加抑制。中央文革在十分被動的情況下，被迫捨卒保車，拋出了兩個小爬蟲王力和關鋒。隨後又捨棄了戚本禹。還連續公開批駁了造反派中流行的「全國處在反革命復辟前夕」、「武裝奪取政權」、「戰爭解決問題」、「進行第三次串連」等等呼號，阻止混亂的進一步發生。毛發布了「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利害衝突。」的最高指示，要求實現革命的大聯合，禁止搶劫槍支和國家倉庫。毛還明確指出：「文化大革命要在1968年春天結束，或者稍遲一點。接著開九大，不能再搞了。」表示要進行收束。11月初，毛提出「大、中、小學都要復課鬧革命」。68年1月，又開始進行「清理階級隊伍」，把造反派的鬥爭狂熱重新轉移到清查本單位群眾中有問題的人們中來。這時期，又號召批判派性與無政府主義。所有這些作法無疑對造反派們是一種約束。

68年3月末的揪出楊成武、傅崇碧、余立金事件，極左派又從中嗅出了「階級敵人的新動向」。認為「右傾翻案是當前的主要矛盾」，「是要為『二月逆流』翻案。」由于當時的鬥

爭已經開始以隱蔽的方式在高層內進行，一般群眾已難明真象，但它的指向是包括周恩來在內的一些元老們，仍然可以從一些跡象中看得出來。從批鬥楊余傅的大會上周恩來公開頌頌為江青諛頌的場景，人們明顯地察覺出周處境的尷尬。反右傾戰鬥又一次激發了群眾隊伍中的派仗高潮。這時，隨著各省革委會的逐個建成，總的大局已相對平靜，只有四川、廣西、陝西等地仍然是兩軍對峙，槍炮轟鳴。而特別搶眼的又是北京高校中清華、北大以及天派、地派的兩派互鬥。毛澤東已經感到是對這些曾出于倒劉的需要而被他縱容、肆無拘檢的紅衛兵小將們進行整治的時候了。「造反有理」，是用來對付劉少奇的；目的達到了，再造反就是無理了。然而幼稚單純、自命為唯我獨革、驕縱成性的小魔鬼，既然放出了潘多拉瓶子，要再收禁也難了。毛澤東不能不使出最後殺手鐮。7月27日，組成浩浩蕩蕩數千人的軍工宣隊，在暴力開道中進駐清華大學。同時，他又親自出馬，召見北京高校的所謂五大領袖，當面警告：現在是你們犯錯誤的時候了。必須立即停止武鬥，否則就是土匪，就是國民黨，就要包圍起來。還要繼續頑抗，就要實行殲滅。到8月29日止，北京所有高校都進駐了軍工宣隊。從趕走劉鄧工作組，「群眾自己解放自己，徹底鬧革命」，一晃兩年之後，兜了一個小小的圈子，又來了毛的軍工宣隊，這對於毛的所謂「群眾路線」，真是絕妙的諷刺。在「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佛祖真言的封蓋下，全國的大小知識分子，從此被打到了五行山下，再也不能翻身。毛還用釜底抽薪的辦法，命令知識分子必須到農村中去，接受農民的再教育。這年12月，全國掀起了讓中學生上山下鄉的高潮。

紅衛兵小魔鬼又裝進了瓶子，大陸的各省市革委會也總算草草地拼湊了出來。9月5日，戲劇性的召開大會，歡呼「全國山河一片紅。」這時，在廣大一般幹部中，對無聊、無盡而又見不到任何得益的派仗本已十分厭惡。革委會成立以後，他們已成為被拋棄而無所事事的人群，無論是革派，還是保派，開始都淪為逍遙派，「一不鬥、二不批、三不改。」毛對付他們的法寶，便是發配往所謂「五七幹校」。他說：「五七幹校」是一個幹部「重新學習的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該這樣作。」于是全國成千上萬的幹部，拋下了在城市裏的妻兒，下到了最貧困的農區，自己動手，托土坯，蓋茅房，闢草萊，種莊稼，養豬放羊，在最不堪的農業勞作中鍛煉。這樣，學生、知識分子上山下鄉；廣大幹部被投入「五七幹校」。在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辛苦農作之餘，昔時那種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揪鬥走資派、批判修正主義的豪情壯志，便再也不見蹤影了。有頭腦的人，開始了深深的反思。

68年10月，由毛一手拼湊的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召開。這個會以通過由江青、康生等所羅織誣陷、由毛澤東親自批准的所謂《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的調查材料》而在歷史上留下了極不光彩、極不嚴肅的醜惡記錄。當表決通過時，會上除了一個陳紹敏大姐毅然投反對票外，其他代表竟更無一人敢于挺直脊骨，對這樣明知是虛偽捏作的東西投自己的反對票。真是「數十萬軍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

劉少奇被扣上叛徒、內奸、工賊三頂恥辱的帽子，永遠開除出黨。正如康生所說的，這才是「永世不得翻身了」。劉的問題已告一段落。但權力角逐的奕盤上卻並沒有出現讓毛澤東稱心如意的格局。首先是慣于和稀泥的周恩來，由于他巧妙應付，假打真保，贏得了許多幹部的感激；同時又任勞任怨，艱難操持，支撐著混亂破碎的政府，贏得了廣大人民的同情。毛、周之間本存在長期、深厚的歷史矛盾。毛澤東對他是既不放心，又不得不依靠他的助力。毛記嫌于周的心態，可以從江青從不失時機地對周的調和態度的敲打中明顯地流露出來。把所謂「伍豪事件」抓住不放，更是隱藏著兇狠殺機，使周恩來臨死前還心懷惴惴。只是因為周行事圓滑謹慎，對毛一心奴伏，甚至曲意阿從江青，使毛和江青確實找不出下手的

藉口。但對於他懷恨在心，殺機隱伏，是路人皆知的。

另一個權力集團是以林彪副統帥為首的武人幫，這一幫人都是原林彪四野的舊部。他們把原在軍隊各系統間的山頭主義矛盾帶到了新時期的權力分配鬥爭中來。楊、余、傅事件以後，黃永勝取代楊成武成為總參謀長。原軍委辦事組改組，黃永勝任組長，吳法憲為副，成員有葉群、丘會作、李作鵬等，決定軍委常委不再開會，辦事組完全取代了軍委常委。這樣，幾乎所有軍權都掌握在他們的手中。九大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寫上了黨章；這個集團的成員都被選進黨中央政治局。他們都是（除葉群外）戰功赫赫的開國功臣，慣于驕縱。他們忍受不了江青的頤指奴使，恣肆張狂。對以舞文弄墨而燥進的張春橋、姚文元輩，根本不放在眼裏。相形之下，九大以後江青一夥雖然也進了政治局，但在政府中都無實職。中央文革小組已取消，他們開始產生一種失落感。在九大報告的起草中，張、姚和陳伯達之間，爭風吃醋。張、姚指責陳伯達有唯生產力論錯誤，從而得以把陳的初稿推翻，由他們來另起爐灶。陳伯達因此大為丟臉而痛心疾首，忿而投靠到林副主席集團一邊來。這時毛對林彪已心懷不滿，無行的陳伯達轉向林靠攏，激起毛澤東的猜疑與厭惡。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召開。毛又一次充分表演了他無尚的家長專制主義淫威，挫敗了林彪集團的挑戰，把那個曾長期擔任過他的政治秘書，被譽為中國最好的馬列主義理論家、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陳伯達揪了出來，一加就是六頂帽子：叛徒、特務、托派分子、假馬克思主義者、國民黨反共分子、修正主義分子。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丘會作也被責令檢查。會後，毛又積極採取措施，一方面是在全國公開批判陳「騙子」，另一方面進行所謂「拋石頭、搵砂子、挖牆角」，對這批手握兵權的危險分子加強防範與打擊。最後，已被逼得走投無路的林彪只好乘機外逃。

9·13林彪在蒙古墜空而死，毛、林險惡、虛偽的政治交易以很不光彩的悲劇結束了。摔死的不僅是林彪，毛澤東的政治信譽也同時從九空墜地，跌得粉碎，留下來的是他們間現世報應的笑料。據說，從此毛的健康一落千丈。

林彪摔死了，最使毛澤東操心和不安的問題，便是一個培養和選擇接班人的問題。有沒有一個稱心合意的接班人，是保證毛式革命路線繼續推進，政權「永不改變顏色」，同時也避免毛自己身後被焚屍揚灰的關鍵的關鍵。毛知道自己年歲不多了，這個事才是急中之急。于是不顧實際，完全從毛主義的主觀模式出發，選取了農家出身，當過兵，在工廠呆過，沒有多少文化，造反起家的上海造反派頭頭王洪文，火箭似的超拔，調到中央來，作為接班人培養。無如造反出身的王洪文，原只是一個耽于吃喝玩樂的惡少，根本不具備管理國家事務必要的品德與文化素養。叢脞的國務，仍需仰仗周恩來艱苦撐持。當毛澤東已明顯的感到必須及時結束文化大革命，恢復正常的政治統治時，他就更必須倚重周恩來的聲望和能力，這就更使在權力上存在失落感的江青忿恨難平，頻頻向周發動攻擊。周恩來原想借林彪集團覆滅的機會，讓極左之風稍加遏制。但立即遭到了毛澤東的嚴厲批評。毛不但不想順坡下驢，反而在極左道路上滑得更遠。他硬指林彪集團不是極左而是極右，而且是右得不能再右。他又藉口周恩來在外交上的表現，把極左絞肉機的螺門擰得更緊，大搞所謂「批林整風」、「批儒評法」，要抓當代的大儒，對周恩來進行敲擊，以示警戒。當重病纏身的周恩來實已不堪重負，而又無人可用的情況下，毛澤東讓宣誓永不翻案的鄧小平戴罪復出，以應付目前。但是當鄧小平的整頓牽涉到動搖與否定毛澤東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時，一場新的反右傾復辟的運動又發動起來，最後借周恩來逝世引發的四五事件而把鄧重新放逐出權力圈。在著實無人可用的窘況下，毛澤東超拔了一個素無背景、被葉劍英評論為「不蠢」的華國鋒，登上了黨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寶座。這讓自認為此位必得的張春橋恨得咬牙切齒。毛澤東選中

華國鋒是有迫不得已的苦衷的。他當然把身後的希望寄托在江青一夥身上。但他還是對江青的分量有所瞭解的，而且知道她積怨太多，無以服眾。王洪文經觀察試用，表現實不成材。姚文元不過是善于舞文弄墨的文膽；張春橋充其量也不過是能搖羽毛扇的狗頭軍師，而且也有歷史問題。靠這班人甚至連撐持門面都難于勝任。至于說繼續他偉大的事業則就更為渺茫。因此，他在76年初的講話中，充滿了無望的悲涼。起用「不蠢」的華國鋒，正是因為他素無背景，而成為左、右兩派暫時都可以接受的中間人物。毛指示華，有事可找江青商量。毛澤東選中這樣的人物自然只是一個過渡，安定目前，以便讓他的極左派親信們在將來有利的時機，平穩地完成權力棒的交接。

二

制度的改革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在剪除前進通道的障礙後所要進行的寄意深遠的「偉大」夢想。在權力爭奪中一貫奉行實用主義，在權術運用上登峰造極的毛澤東，是向來最喜歡以一個思想家、理論家、古今中外、博及群書、無所不通的學問家出現的。他自吹《資治通鑒》讀過十七遍，但《資本論》卻沒有看過一遍，但他仍然大言不慚的自命為馬克思的正傳宗主，並把馬克思主義發展到了新的極峰。他倒劉也絕不願讓人看出來是權力的爭鬥和私怨的報復，而是深奧莫測的理論鬥爭、路線鬥爭，儘管什麼是修正主義，他至死也並不清楚。因此，在倒劉的同時，他又把他一心嚮往的理想主義改革抬了出來，唬弄無知的人們。在運動初通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十六條》）裏，就確立了運動的鬥、批、改三階段。「我們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于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一句話，他毅然發動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要打破一個舊世界，建設一個新世界。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這是什麼樣的一個新世界。

1966年5月7日，毛澤東就林彪在軍委後勤總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的呈報中寫了一通充滿哲學遐想的著名批示，即所謂《5·7指示》，其中說到：

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教四清運動。四清完了，隨時都有群眾工作可做，使軍民永遠打成一片。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這樣，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但要調配適當，要有主有從。農、工、民三項，一個部隊只能兼一項或兩項，不能同時都兼起來。這樣，幾百萬軍隊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樣，工人也是這樣，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參加批判資產階級。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例如大慶油田那樣。

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

以上所說，已經不是什麼新鮮意見、創造發明。多年以來，很多人已經是這樣做了，不過還沒有普及。至于軍隊，已經這樣做了幾十年，不過現在更要有所發展罷了。

這個冗長的批語，與稍後的5·16通知，堪稱雙璧，充分的暴露了毛澤東思想的真實性質。1966年8月1日，《人民日報》曾就這個批示寫了題為《全國都應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的社論。文章說：「毛澤東同志總結了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各種經驗，研究了十月革命以來國際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各種經驗，特別是吸取了蘇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實行資本主義復辟的嚴重教訓，創造性地對如何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保證逐步向共產主義過渡這些問題，作出了科學的答案。」真是推崇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然而實際的情況又是什麼呢？

王祿林先生在《5·7指示初探》中指出：「五七指示實際上是毛澤東的建設一個新世界的宣言書，它寄托著毛澤東的政治抱負和社會理想。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正在於通過『砸爛舊世界』，達到『建設新世界』。《指示》就是這個新世界的綱領。《指示》與《五·一六通知》是互相映照的姊妹篇，一個主旨在「破」，一個主旨在立；一個是砸爛舊世界的綱領，一個是建設新世界的藍圖。」王先生同時也指出：毛澤東新世界的理想藍圖是一個「以自然經濟和平均主義為特徵的社會主義模式。」「毛澤東晚年的一系列錯誤，都可以用他的『左』傾社會主義模式來說明。」。

這是正確的。細繹《指示》全文，我們不僅可以知道，這一綱領是解放戰爭時期毛式軍事共產主義的延續，同時也讓我們仿佛看到了1958年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身影。它是構成毛澤東思想的固有真髓，是構成毛澤東思想兩大內容的一個重要方面。毛澤東思想兩大組成部分，一就是空想的毛式社會主義，另一方面就是他暴烈的階級、階級鬥爭學說。毛的這個新社會不是通過社會生產高度發展來完成，而是通過階級鬥爭來完成。因此，它必然是，也只能是一場窮過渡、一個暴力的過渡。這是典型的封建社會主義、農業社會主義，而根本不是什麼馬克思主義。根據這個理論，1949年建國以後，毛澤東便馬不停蹄的在這個又窮又落後的國度裏急不可耐的藉暴力向社會主義過渡。於是，運動一個接一個，鬥爭一陣緊似一陣。由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工商業改造、農業合作化、反右鬥爭、大躍進、人民公社，進而反右傾機會主義，實行的就是這個窮過渡、武過渡。結果，迎來了三年困難時期，碰得頭破血流。但他仍然豪氣十足，猶自以為「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他仍然拒不承認自己有任何錯誤，而把失敗歸結為別人沒有遵照他的指示辦事，離開了毛澤東思想的正確道路。幾年以後，他捲土重來，打倒了為他擦屁股有功的劉少奇、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的旗號下，變本加厲的在他一貫堅持的窮過渡、武過渡道路上，把國民經濟推向了崩潰的邊緣，把人民驅到了災難的深淵。不僅如此，他還聲明，這樣的運動今後每七、八年都要進行一次，直到把中國帶進他設計的天堂。

事實表明，解放以後的許多重大時刻，毛澤東在瞻望前程，抒發理想時總是魂牽夢縈的忘不了他的理想夢。他大不滿地表示，在進城以後，官做大了，條件好了，幹部染上了官僚主義，脫離了群眾，這就是修正主義的根源。他不懂裝懂地從馬克思著作中撿來了「資產階級法權」這一概念，把現實社會中工人實行八級工資制、軍隊的軍銜、幹部的薪給，都視為資本主義這個惡魔的罪惡，大加撻伐，總是盤算著趕快把它廢除。這種想法，浸透了毛全套社會主義的構想，貫穿了從解放後直至文化大革命的全部過程。關於文革以前，我已有專文討論，現在就單論文革中的表現吧！

1966年12月初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提出了消滅「資產階級法權」（當譯為「資產階級權利」），取消實行薪給制的問題。

他說：

搞供給制，過共產主義生活是馬克思主義作風，與資產階級對立。我看還是農村作風、游擊習氣好。二十二年的戰爭都打勝了，為什麼建設共產主義就不行了呢？為什麼要搞工資制？這是向資產階級讓步，是借農村作風和游擊習氣貶低我們。結果發展了個人主義，講說服不要壓服也忘了。是不是幹部帶頭恢復供給制？

要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例如爭地位、爭級別、要加班費、智力勞動者工資高、體力勞動者工資少等，都是資產階級的思想殘餘。「各取所值」是法律規定的，也是資產階級的東西。將來坐汽車要不要等級？不一定要有專車。對老年人、體弱者可以照顧一下，其餘就不分等級了。我們的黨是連續打了二十多年仗的黨，長期實行供給制，從幾萬人增加到幾百萬人。一直到解放初期，大體上是過平均主義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是靠什麼物質刺激，而是革命精神鼓舞。

12月6日，周恩來大概是針對毛的這一段話，曾經委婉的表示：「現在實行供給制，一定要把思想基礎打好，才能實行。不然，大家都實行供給制也不行嘛！」12月18日，江青在一次講話中還提到：「最近我們想把級別搞掉。」表明這個問題又一次出現在毛的考慮之中。

1967年4月29日，毛澤東在他的《一個指示》中說：

（三結合）要有群眾參加。十幾年了，我們脫離了群眾，49、50、51、52年群眾歡迎我們，那個時候幹部吃住很簡單，吃小米，住帳篷。進城後搞薪金制，群眾就不歡迎我們了。」在當時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的會上，他又說：「我們黨在49年、50年、51年這三年當中，群眾是擁護我們的，是尊重我們的。因為當時是艱苦樸素的。吃小米、住帳篷……52年以後情況就發生了一定的變化，我們幹部在群眾當中開始受冷落。當時，在幹部當中實行了薪金制……薪金制我是不贊成的。我們這次文化大革命是要把它改變過來。」

在5·1節會見幹部時，他還特別指示：「為避免脫離群眾，以後實行供給制，取消薪金制。」

1974年10月20日，毛澤東在接見丹麥首相保羅·哈特林時也說到：「總而言之，中國屬於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

同年12月，毛在長沙對周恩來、王洪文談話時又指出：「總而言之，中國屬於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類如上臺，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點馬列主義的書。」他指令張、姚寫關於這方面的文章。姚文元隨即寫了《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張春橋寫了《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文章反覆申述消滅「資產階級法權」。張、姚還選編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無產階級專政》的語錄，供國人學習。特別指示「各級黨委一定要把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理論

的學習抓緊、抓好。」「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進行到底。」

1975年5月，有人提議對農村中不同自然條件和生產效率高低的生產隊進行糧食徵購時，將好的定價低些，差的高些，以消除「事實上不平等的資產階級法權」。毛立即批示，進行試驗。8月，毛又親自對陳永貴的《對農村工作的幾點意見》作出批示，要求政治局討論所提出的在短期內將人民公社核算單位由生產隊過渡到大隊的問題，並在九、十月召開農村工作座談會，又一次企圖再搞窮過渡。

上述材料表明，在整個文化大革命中，毛所孜孜以求的都是在為限制與消滅「資產階級法權」而奮鬥。他所追求的正是在本質上是烏托邦主義的，反馬克思主義的封建社會主義，正因為如此，在所謂文化大革命中，在徹底打倒舊文化，樹立新文化的囂嚷中，沉渣泛起，一些反馬克思主義、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在中國都浮上了歷史的前台。

杜蒲《極左思潮的歷史考察》一書中，分析了在文革期間流行在中國的三種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概念。一是非商品經濟的社會主義觀念。即否定商品經濟，把它當成資產階級法權（資產階級權利），必須限制。這一點，從人民公社到五·七指示，都貫徹這一精神，這是大家都清楚的。二是營房式的社會主義觀念。所謂「營房式」，是馬克思用來形容那種以小生產為基礎組織起來，帶有軍事集體化和平均主義特徵的社會主義，他們也把它稱之為「粗陋的」或「禁欲主義」的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在革命戰爭期間，以軍事共產主義為名，為毛澤東所特別稱讚，而且在解放以後，極力在新中國環境下繼續推行。它的核心就是自給自足的小農平均主義。三是以貧窮、愚昧為核心的偽社會主義觀念。窮則革命，富則變修。一張白紙，好寫最新最美的圖畫。所有這些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都是毛澤東小農社會主義思想的寫照。（第54—60頁）

應該指出「資產階級法權」，確切的譯法應該是「資產階級權利」，是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一書中提出來的，是對拉薩爾的批判。毛澤東有沒有讀過《哥達綱領批判》一書，自難肯定。但他對馬克思所說「資產階級權利」完全是誤解，把自己站到了馬克思所批判的拉薩爾的立場，這是肯定的。1983年出版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中也明白指出了這一點。對馬克思的重大原則誤解、曲解，而大加撻伐，這發生在一個自命為最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身上，真是只有讓人啼笑皆非，不知該怎麼講才好。按照這樣的路子再胡搞下去，中國真不知會淪落到什麼地步。值得慶幸的是在他這個偉業還來不及大力推行時，他就去見馬克思了。人一死，四人幫也就迅速徹底垮台。然而，這一通不世之業雖成為泡影，但在這種思想指導之下，毛在文化大革命中通過一系列所謂社會主義改革，確是幹出了許多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業績」來。

在政權建設方面，革命委員會的建立無疑是毛最得意，但也許是最荒誕的傑作。「奪權」，實際上是兩派、甚至幾派為搶一顆公章而輪番惡鬥。它形成所謂文化大革命中又一曠世奇觀。在全國奪權完全是一個衝動而輕率的決策。毛澤東把聶元梓的大字報胡吹為什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北京人民公社宣言。他是要把巴黎公社的舊劇百年之後在中國重演。因此，上海一月奪權後就立即打出「上海人民公社」的招牌。但最後權衡得失，還是放棄這個心嚮往之的革命名稱，決定「還是革命委員會好。」關於革命委員會的組成，幾經改易，最後確定為「三結合」，即有革命幹部的代表、有軍隊的代表、有革命群眾的代表。1968年3月30日兩報（《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一刊（《紅旗》雜誌）發表的社論《革命委員會好》中，說《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要實行一元化領導，打破重疊的行政機構，精兵簡政，組織起一個革命化的聯繫群眾的領導班子。」其實這純粹是欺世盜名之談。這種作法不僅加劇了黨

政不分、軍政不分的舊存惡習，其他的所謂優越性不是徒具形式，就是反使舊有的劣質更有變本加厲的惡性發展。至于說到精簡，事實上完全是脫離實際的空想。毛指示張春橋，上海搞二十個吧！李雪峰在河北，就曾揚言，省革委會要精簡為120人，都不過是一句空話。毛澤東「勇敢地」把國家機關、包括行政組織到公檢法都衝垮了，但是軍隊卻視為命根子，並靠它來接管政權。在原有的幹部認為都不可靠，仍然軟禁在五·七幹校勞動時，于是把一大批轉業軍人安置到革委會來。這批軍人文化水平低，根本不具備必要的業務知識與技能，這個政府的效能就可想而知。要想辦事，最終還得把那些在五·七幹校的業務人員召回來。因此，文革後期，成員非但沒精簡，反而又增加一倍。至于領導幹部，運動的每一個階段都有人被衝擊靠邊站，後來又查無實據而官復原職，一個機關往往出現官多兵少的奇怪現象。所謂「巴黎公社原則」，更是騙人的鬼話。正像馬克思所說的，歷史現象往往驚人的相似，但如果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作為悲劇出現，那麼，第二次在毛主席的表演中，卻成了一個諷刺性的笑劇，儘管招牌是打得一樣的。

所謂「改」在教育領域中造成更為巨大的毀滅性效果。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受到致命衝擊的就是教育界、文化界。紅衛兵一起來造反，教師就首當其衝。無知衝動的中學乃至小學生，任意給他們的老師加上修正主義、資產階級思想的罪名，把對教師的人格污辱，惡作劇的虐待和任意打罵當成為革命表現，肆行凌辱。直至文化大革命的後期，還以批判「師道尊嚴」而繼續作踐他們，連一個劇本《園丁之歌》都當成資產階級右傾復辟潮流而大張撻伐。整整十年，學校先是被造反派整成一個底朝天，繼而雖說要複課鬧革命，但仍然派仗紛紜。學生完全沒有任何拘束，上課可有可無，考試就交白卷。因此國家在教育上出現十年以上的可怕斷層。這真是一個古今中外都不曾有的文化災難。後來大學入學的試卷中，考生竟有 $1/2+1/2=2/4$ ；「孫中山」、「閻錫山」這座「山」究竟在什麼地方都不知道的天大笑話。毛澤東把學校污蔑為修正主義、資產階級思想的大染缸。甚而至于把整個包括解放後十七年共產黨領導下的所有學校，都毫無例外的全盤否定。1971年4月至7月中召開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提出了臭名昭著的所謂「兩個估計」，宣稱建國以來的十七年，「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基本上沒有得到貫徹執行，教育制度、教育方針和方法幾乎是舊的一套。」「大多數的教師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兩個估計」徹底否定了中國的教育，所有學校培養出來的學生，都背上了一個舊學校培養出來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惡名，為了贖罪，他們必須發配到農村去，接受農民的再教育。

毛澤東擬定的教育改革，在農村，小學由貧、下中農組成的管委會來領導；城市則走工廠辦學的道路。徹底貫徹他一貫的仇視文化，仇視知識分子的政策，讓外行領導內行，甚至荒唐到選派工、農、兵學員進大學，讓他們「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簡稱「上、管、改。」真是斯文掃地！千古所無。其結果是造成人材雕零，學術倒退，文化破碎，愚昧大行。在世界的文化競賽大潮中，我們白白地耽誤了寶貴的時光，在許多學科中，成了一名可悲的落伍者。

文化界的狀況也是慘不忍睹。像老舍、傅雷這樣的優秀人材，都在不堪凌辱下走上自殺的道路。有的則在揪鬥中慘遭殘害。罹這種浩劫而死去的人太多了、太多了。他們很多都是國家瑰寶、民族精英，就都這樣冤屈無告的被摧殘。這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德政」。毛澤東在文化戰線上執行的兩手，其一就是「破」，也就是批判，幾乎是沒有不被批判的專家學者，沒有不受批判的文化學術行業。上及孔夫子的「克己復禮」，廣及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都在大批大破之列，誣栽、污辱、謾罵、威脅，無所不用其極。毛澤東宣稱，大破就是大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他自認這是辯證法，其實，這完全是詭辯。文化的發展，只有革新，

而不能有什麼革命。革新是在批判繼承中的發展，破只不過是批判，不能簡單歸結為便是立。兩手的另一手就是「禁」。報紙就保留幾家黨報，刊物就存下一個《紅旗》，出版物就只有毛澤東著作。圖書館遭封存，娛樂性的場所被封禁。文化成了一片荒灘，學術只留下一片空白。革命的惟一「創造」就是由「文化大革命旗手」江青掛名牽頭所炮製的「樣板戲」。它們被欽定為毛澤東思想教材，用紀律強迫人們學習。說來應是慚愧，毛澤東以標榜文化革命為名，像一頭水牛進了瓷器鋪，糟蹋了全部文化領域，但他以社會主義名義作出的改，或者說「立」，卻只有幾個因與文革直接聯繫而至今令人看而反胃的「樣板戲」，真是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和諷刺。

綜上所述，毛澤東是懷著向他所設想的毛式社會主義無所顧忌的推進而發動文化大革命，推倒劉少奇，重新奪取第一線的權力的。他還希望通過取消資產階級法權，不斷革命，達到他的理想目的。然而，年壽有盡，而遺憾無窮。「萬歲」聲中的毛澤東還是死了。地球畢竟還照樣在轉，歷史總是無可阻擋的向前進。任何人，無論他活著時權勢如何強大，誰都逃不過歷史的審判。在這個審判台前，一切權謀，一切諛頌，一切謊言，一切偽飾，都會得到公正的裁判。我深信這一天總會到來！

2006年5月于北京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五十七期 2006年12月30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五十七期（2006年12月30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